

农村大席

张君燕

早些年,豫西北农村婚丧嫁娶的宴请都在自己家里举办,门前屋后摆上方桌,每张桌子配4把条凳,可以坐8个人,一般摆十几桌就够了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我们村在外做生意的占叔给儿子娶媳妇,宴席摆了将近八十桌,村口停放的小轿车都有十几辆,可以说是非常罕见。占叔几乎请了全村的人来帮忙,光是香烟,就发出去了十几条。

在农村,宴请是一件大事,很多人一辈子可能也就只有两三次机会。办好了,每次提起脸上都有光,能变成下半辈子的荣耀。办不好,乡亲们的每次宴请,都是一场无声的对比。

不论是喜事还是白事,择好日子后,第一件事就是预定宴席掌勺的大厨。尤其是选在“大好”的日子,办喜事的人特别多,大厨更抢手。如果主家希望“席厚”一点,大厨会列出讲究点的食材让主家去采购,量也会大一些;如果主家想着“席薄”一点,大厨就会换成经济实惠的食材,也不会显得过于寒酸。好的大厨,既能保证食材充足,又不会浪费。

宴席前一天,要杀鸡、宰鱼、炖肉、择菜、洗菜。主家会挨家挨户请来乡亲帮忙。一般来说,乡亲们都不会推辞,还会特意请一天假。谁家不会遇事?互相帮衬着最重要。

在正日子,主家要忙着走各种流程,一般是由家族里有威望的人担任执事,料理宴席。

一早,执事就在主家门口贴上了红纸,写明分工。有摆桌椅、分发烟酒的,有传菜的,有洗碗的,有收尾的。负责账桌的先生活计最为轻松,但得是德高望重的长辈,往账桌前一坐,就对得起“先生”这个称呼。

怀川地区的标准农村宴席是“三八席”,即八个菜、八个小碗、八个大碗,汤汤水水比较多,又称为“水席”。旧时条件有限,碗盘很少,上一道菜,就得撤下一批碗盘,迅速洗干净之后,接着装下一道菜。整个过程节奏紧凑,如行云流水一般。

热热闹闹地忙碌一天,送走宾客后,主家会略备薄酒,犒劳参与劳作的乡亲们。主家也坐下来,吃几口菜、喝几口酒,缓解几天来的紧张和疲惫。

如今,操办红白喜事大多选择酒店,省心又省力,乡亲们只管安安稳稳地坐下吃席。热闹依旧热闹,高兴也依旧高兴,但吃惯农村大席的我心里却有些失落,总感觉似乎少了一些什么……

《成都记》曰:“琴台院,以司马相如琴台得名,而非相如旧台;在浣花溪正路、金花寺北,厢号海安寺。梁萧藻镇蜀,增建楼台,以偕游观。元魏伐蜀,下营于此,掘为堑,得大瓮二十余口,盖所以响琴也。隋蜀王秀更增五台,并旧为六。”据此可知,原来真正的琴台即旧台早经挖掘,而且在台下挖出了二十多口大瓮。据研究,在琴室及戏台下埋大缸可增加混声回响效果。如此看来,琴台原是利用声学效应强化音乐共鸣的巧妙建筑。

琴台,曾是墓葬的讹传,且不止是王建墓的讹传。乾隆《灌县志》记载:灌县东十五里有“刘海井”“刘海坝”“刘海堆”,“或曰堆处,人履其上辄铿然有声,盖即相如之琴台也。”《听雨楼随笔》记蓬州、成都、临邛三处皆有琴台,而墓在灌县,并未言灌县亦有琴台。据《灌县志》所述,刘海堆恐非相如之琴台,实乃司马之坟堆。墓室中空,故能铿然有声。《灌县志》疑其为琴台,正如王建的永陵尝被讹传为琴台也。

长卿治别业于此。墓在灌县东十二里。”从唐到清,从官方到个人,从地志到笔记,几乎众口一词,都称司马相如墓在灌县;《听雨楼随笔》此处的方位和数据,不过是源自唐代的《元和郡县志》罢了。

琴台,只是司马相如居所即其故宅的一部分,上引“琴台在宅右”可以旁证。因此,唐人梁载言《十道四蕃志》云:“成都有琴

相如琴台

林赶秋

又有了不太一样或更深的认识,现综述如下。

琴台,不仅成都有,其他地方也有。明人曹学佺《蜀中广记》卷二十七曰:“按《十道记》云:‘果州左滨西汉水,丛薄蔚然,有相如琴台。’观此,则嘉陵江之为西汉水益明矣。”此乃蓬州琴台。清人王培荀《听雨楼随笔》卷七曰:“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,实今之蓬州人,后迁成都,又居临邛,三处

皆有琴台。蓬州,隋之相如县,以相所居之地为名。明初,乃省入蓬州。其故宅在州南,琴台在宅右,傍嘉陵江。《周地图记》:‘台高六尺,周四十四步,后人建祠。’明学使卢雍诗云:‘蜀中人物称豪杰,汉室文章擅大家。此地卜居犹故迹,当时名县岂虚夸。琴台积雨苍苔润,祠屋滨江草树嘉。莫问少年亲涤器,高风千载重词华。’江北有相如坪,传

方勇是市话剧团的演员,不少观众对他的戏赞不绝口。这天下午他出门办事,经过一个路口时电动车突然没气了。推行100多米后,方勇发现了一个补胎点,欣喜地把车推了过去。

师傅五十岁出头,瘦弱黧黑,瞅了一眼电动车说:“是后胎吧?来,你坐一会儿,我补胎很快的。”师傅动作麻利地把后轮拆下来,转动轮胎开始检查漏气点。“谁这么缺德!”师傅突然说了一句。方

台,即相如与文君贯酒处”;《成都城坊古迹考》云:“历代盛称之琴台,即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居住之地。”这两种说法均不太对。为准确计,应该这样表达:历代盛称之琴台,既非相如文君之故宅,亦非他俩贯酒或卖酒之处,实即二人居住地范围内的一个独立建筑物。

琴台,曾是旅游景点琴台院取名的由头。唐人卢

演戏

一路向北

勇急忙凑过去,见师傅从轮胎里拔出一颗螺丝钉,说道:“上午有辆电动车,也是被这种螺丝钉扎破了胎。”

这句话让方勇惊讶不已:如果有人故意在路口撒螺丝钉,附近补胎的人肯定最有嫌疑,这是贼喊捉贼?师傅看了方勇一眼,似乎察觉到方勇的狐疑,急忙解释

说:“我不赚昧良心的钱。”方勇没有接话,只是笑了笑,心里嘀咕道:“真会演戏,比我演得还好!”

付钱时,师傅突然问方勇:“你在哪里爆的胎?”方勇指了指不远处,说在前面那个路口。说完,他骑上电动车准备离开。电动车刚刚启动,方勇就从后视镜里看见师傅扛了个大扫帚,火急火燎地向那边的路口走去……



《粪的价格》外,其余稿件均为宋之的从上海组来。

在新文学创作与左翼报刊并不发达的天津,作为公开出版物出版发行,《当代文学》的出现是一个例外。也正因此,“北方左联”及时吸收王余杞为左联成员,并对《当代文学》的编辑出版给予指示。因此,《当代文学》实际上已成为当时“北方左联”在天津的机关刊物。1936年,美国作家埃德加·斯诺在其编译的《活的中国》一书中,把《当代文学》列为“刊有论现代中国文学的极有价值的资料”。遗憾的是,他将出版地误写为上海。

然而时间不长,《当代文学》那浓厚的战斗色彩,及鲜红的封面被当局误以为是鲁迅所编刊物。1934年11月,当刊物出至第六期时被查封。对此详情,当年11月28日的《大公报》曾有报道。

继《当代文学》之后,天津书局还曾出过一本进步刊物《暖流》半月刊,但也是出版未几,便被当局定性为“捏词诬蔑……煽惑民众”,最终

予以查禁。

《当代文学》与《暖流》虽然夭折了,但柯益茂却将出版业务转向了图书。不同的是,它们已不再具有鲜明的红色,而是被大量灰色书刊及旧派通俗小说所替代。例如1938年底,天津书局便已出版了姚灵犀的《瑶光秘记》《采菲录》《思无邪小记》,以及郑证因、白羽的武侠小说《牧野雄风》《十二金钱镖》等。对此,韦君宜印象颇深:“抗战一开始,我从北平跑回天津的家。再去天津书局,只见书架上摆满了《蜀山剑侠传》之类的书,我抬头看老柯,默然无语。后来我就没有再去过了。”

而在1941年的一份“天津书局图书简目”上,更是汇集了董荫孤、李薰风、赵焕亭、兔公、刘云若、还珠楼主、孟画如、月明楼主、陈慎言、戴愚庵、李燃犀、李山野、徐春羽、朱贞木、王日叟、刘渥水等平津通俗小说作家的大部分作品。至于出版方式,则为书局一次性买断作者的书稿,任由书局一版、二版甚至数版重印。

中共天津地委旧址

位于和平区的求志里17号,是成立于1924年9月的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最后一个办公地点,这个当年的秘密机关至今仍隐匿在闹市里。在至暗时刻,这里曾有一对革命伉俪,用鲜血和生命,为了解放与自由,写下不朽的传奇。

1921年,赴法勤工俭学的李季达结识了革命战友周恩来;在天津,出身书香世家的王贞儒,与邓颖超是同窗挚友,也是革命战友。在“觉悟社”,邓颖超的代名为“逸豪”,王贞儒则为“卓吾”。

1925年,25岁的李季达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回国,来到天津,成为继于方舟后的第二任地委书记。

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二级巡视员王凯捷介绍:“李季达任天津地委书记,他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领导天津的工人运动,声援五卅。最多的时候,发动十几万工人上街游行。另外,他最大的一个成绩就是(在天津)发动了海员大罢工。”

海员大罢工持续三个月

之久,致使在津外国轮船无法开动,整个港口陷于瘫痪,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。与此同时,天津地委不断壮大革命队伍。

在这里,李季达与时任妇女部部长的王贞儒相识,在配合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期间,相互吸引、信赖,迸发出爱情的火花。后经组织批准,他们于1927年元旦结婚。1927年4月,革命形势急转直下,李大钊在北京被捕,不久就义。4月18号,军阀当局下令把“义庆里事件”中涉及的江震寰等15人押往南市刑场杀害。

面对白色恐怖,李季达一面叮嘱各级组织谨慎行事,一面将党的重要文件和天津500名党员名单存入法租界浙江兴业银行地下金库的1号保险箱内。

1927年8月,由于叛徒告密,李季达夫妇先后被捕,在狱中,李季达受尽酷刑,却坚贞不屈,宁死保守党的秘密。威逼利诱不成的敌人,就让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王贞儒,看

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教育频道

霍五月 撰文



解说词

着丈夫受刑。

这痛彻心扉的相见却成了永诀。1927年11月18日,李季达被反动军阀杀害,年仅27岁。几十年后,王贞儒在撰写回忆录时,仍然心痛不已:“季达受刑时的惨状,总是历历在目,永不得忘却,呜呼痛矣!”

白色恐怖过后,李季达冒死保存下来的党员名单等文件,最终被交给党组织,他的牺牲凝固成妻子心中永远的痛。

红色记忆系列特辑

网络新词语

自律文学

赵超

“自律文学”是网友用以自嘲和调侃自己网络生活状态的一种流行语。当网友们一本正经地说出自己正在干的事情时,看似前半段是正常的,但后面是搞笑的谐音梗,比如“在读博,读的微博;在读书,读的小红书;在学音乐,学的抖音”。

连载

沽水文澜

倪斯霆

七十一、推出《当代文学》

1934年7月1日,《当代文学》创刊号出版,立即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。王余杞在《发刊词》中指出,国内许多带有时代感的进步刊物在当局“围剿”下,“不遭流产,必也夭折”,因此《当代文学》的任务是“应当以广大读者为对象,应当合乎广大的读者的需要”,“本刊最大的目的就在成为读者们一个公开发表作品的处所”。在创刊号上,除董秋芳翻译的《大战后的欧洲文学精神》与徐盈的小说